

生态文学: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源泉

张晓琴¹ 沈 玲²

(1. 南京林业大学 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2. 徐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工业革命之后,生态危机愈益严重,人与自然矛盾日益突出。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审视,是切实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的必由之路,而拯救人类的灵魂、改变其思想和价值观,正是生态文学出现的意义所在。生态文学关注自然危机以及人的信仰危机,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冲突,并且力图找出危机产生的根源及解决方式。生态文学伴随着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发展成熟,它已经成为当前建设和谐社会重要的文化源泉。

关键词:生态文学;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9)04-0075-03

社会和谐是全面系统的和谐,要求矛盾的双方或多方在运动中能够达到并保持双赢或多赢的局面。和谐社会内在地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生态文学揭示生态危机,弘扬生态责任,推崇生态整体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在传播生态思想,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从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

一、人与自然的冲突呼唤生态文学

远古时代,人类的生存最初完全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因此大自然在人类的心中神圣不可侵犯,人类对自然充满着敬畏甚至恐惧之情。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学会了冶炼技术,步入了农业文明社会;而蒸汽机的发明,又标志着人类进入了工业时代,伴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驾驭、主宰自然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尤其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与人类认识、实践能力的增长,人类普遍盲目乐观地认为人无所不能。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由远古时代的恐惧、敬畏发展到对自然的征服与主宰,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世界的主人。这种意识的片面张扬助长了人类对大自然不计后果的掠夺和征服。在短短两三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的确创造出了比以往几千年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财富,但正当我们陶醉于工业文明带来的繁荣和巨大财富的时候,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却已频频发出警告:温室效应、臭氧层

破坏、酸雨污染、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等,在各种危机的重压之下人类步履维艰。

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越来越清楚地告诉人们:人类非生态的现代化理念和实践模式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认真检讨和更新传统的现代化理念和实践模式,把生态现代化视为社会整体现代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价值追求。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工业文明的危机,必须在精神领域树立新的价值观,人类只有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以尊重为基础的和谐关系,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失衡问题才有望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如同新人文主义思想家皮埃尔·卡蓝墨所说:“环境与生态问题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科学问题,它更是一种思想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关注于解决具体问题,那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1]。这里的“本”就是指一种思想认识问题。

唐纳德·沃斯特也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并断言:“整个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自然的经济体系已经被推向崩溃的极限,而‘生态学’将形成万众的呐喊,呼唤一场

收稿日期:2009-01-15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08ZWD021)

作者简介:张晓琴(1969—),女,江苏淮安人,副研究员,硕士,从事生态社会学研究。

文化革命。^[2]海德格尔在意识到重拯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是一致的问题之后,强调在拯救地球的同时,还要拯救人类的灵魂。如同鲁迅当年在寻求改造国民思想利器时候的感受: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海德格尔在寻求拯救世界的一剂良药时,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学艺术。他把拯救地球和拯救人类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了文学艺术上。因为,唯有文学艺术对人类灵魂的关注,才是一种具有纯真的天性与诗心的关注,才是一种更具真、善、美的关注,因而也是更具世界意义、更为世人接纳的精神通道。因为这些大师们的关注和呼吁,生态文学在警醒人们关注自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愈发显得重要起来。

二、生态文学的内涵

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作家对生态环境所体现的一种终极关怀必然通过作品体现出来。人与自然是和谐还是冲突的关系渐渐成为作家创作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许多作家面对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写出了优美的充满哲理的生态文学,从而审视和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审视和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学应运而生。它以揭示生态危机及其社会根源,呼唤保护意识,弘扬生态责任,推崇生态整体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突出特点。

生态文学作家对人类当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猛烈的批评态度。他们往往用生动形象的文学语言展现被破坏了的自然之可怕,以促使人类意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长久以来,经济主义价值观使人类习惯于以狭隘的功利眼光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为了经济利益不断地利用、开发、掠夺大自然。这种只看到自然的经济价值的经济主义以及只把大自然看作人类工具,对自然进行无情掠夺的行径,都是生态文学抨击的对象。1962年美国生态文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描述了滥用杀虫剂对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危害,对人类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了无情批判,对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刻揭示。卡逊说:“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4]^[3]加拿大法利·莫厄特的《屠海》对人类为了经济利益而疯狂屠杀其他生

命、造成生态系统严重破坏的行径进行了无比悲愤地控诉。中国的生态文学发展起步虽晚于西方国家,但也渐成气候。徐刚针对全国各地滥砍滥伐森林,严重破坏自然植被的现象创作了《伐木者,醒来!》;冯役军在他的《黄土地 黑土地》里揭露了中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因被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而造成土地严重荒废和流失的惨痛局面;岳非丘通过《只有一条长江》,揭露了由于长江沿岸人们盲目发展经济,导致长江水质被严重污染和三峡美丽风景有可能毁于一旦的可怕状况。亦秋在《涨潮时分》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座座化工厂在一个海边城市拔地而起,从而使该市的经济飞速发展,然而由于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各种灾难也接踵而来:台风、海潮……昔日带来经济繁荣的海边工厂一个个被摧毁,副市长李蓝也在抗击台风中牺牲。小说通过描写自然对人类无情的报复说明了人类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依赖关系。警示人类如果在经济发展中忽略了生态环境,所谓的经济腾飞只能是“昙花一现”,而且还将危及人类的生存,副市长李蓝的牺牲,就是一个警告。小说批判了以经济主义价值观为依托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告诫我们:人类必须用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审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文学作家试图通过文学作品教育人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认为人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要求人类不仅要承认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是具有独特价值的生命体,尊重共同体中的其他伙伴以及共同体本身,而且强调人类又有维护自然共同体和谐与平衡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的土地伦理观就是这一价值观的体现。“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5]。2004年中国的畅销书《狼图腾》陈述了内蒙古草原既有狼害又与狼不可分离,既恨狼又敬畏、崇拜狼,所谓“学狼、护狼、拜狼、杀狼”的图腾崇拜和精神悖论,形象地揭示出草原万物生态的内在关系,生动地诠释了生态整体观。

生态文学非常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认为人类必须对所有生物的生存和整个地球的存在负起责任。人类必须将自己置身于自然万物大系统之中,进而对整个系统以及系统内部各种关系的和谐、平衡负责,倡导为生态整体利益做出自我牺牲。

在当今的发展阶段人类应该思考并做到最大限

度地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学家达成的一种共识。例如,物质生活最大限度简单化和精神生活最大限度丰富化,就是一种许多生态作家都描写的理想生存方式。所以在揭露生态危机、倡导生态整体观的同时生态文学也为人们指明了一种与环境友好相处的生活方式: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生态文学的经典作品《瓦尔登湖》中,梭罗不仅描写了宁静、美妙的大自然,而且身体力行地隐居于自然山水之中,在和大自然“交流”、“对话”、“沟通”中达到和谐相处、物我交融的绝妙境界,同时他也积极倡导与大自然协调的物质简朴、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国家公园》是20世纪初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领袖约翰·缪尔的作品。缪尔通过对自然光芒四射的描写,使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与和谐,不断地提醒我们对大自然的需求和我们对大自然的责任,也不断地引领我们走向荒野深处,聆听、欣赏、感受、融入自然,最终保护自然。而且这种生存方式,在当今发展阶段不仅可行,也是回归自然的必要前提。

在深入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生态文学确立和传达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的生态价值观和发展观。它不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去观照自然,而是以生态主义和持续发展的观念去审视对象,不以人类为尊,不以万物为卑,给自然以同等的尊严和尊敬,在深悟“物我两亲”、“天人和谐”之道的基础上,着力创造一个生命与其存在环境相融洽、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生态秩序井然而又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世界。

三、生态文学促进人类生态观的树立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源于社会生活,同时也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并不是直接产生的,而是通过对人们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来改变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鼓舞人们去改造自己和周围的环境,进而影响社会生活的发展。

生态文学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认识到当前人类的发展模式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破坏以及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从而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促使其采取行动,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进。如此多的作家把生态题材纳入自己的创作中,其目的就在于以此促成一种能与毁坏大自然的势力相抗争的新的处世态度。面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现实,作家们用生态文学向人们提出警告:如果人类继续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而忘掉自己对自然应尽的义务,那么人类将同地球一起毁灭,并提出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倡议:“保护我们

的星球——地球”。

在人们普遍患有生态环境“近视病”,急需普及生态知识的当前,单靠科学有时很难解决问题。而当单调枯燥、深奥难懂的科学理论或思想以新鲜生动的文学形式表现时,就会给人以全新的感觉。如作家“对江河湖泊变迁的欣喜与震颤,对沙漠荒原侵蚀的怒吼和控诉,对蓝天白云广袤草原的眷恋和呼唤,对珍禽异兽濒危灭绝的痛惜和可怜,对名胜古迹自然风光的流连忘返,对现代生活给人类带来的文明和弊端发出的称道和喟叹。”^[6]这些客观的叙述、形象的描绘,会使人们认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以及保护自然的必要性,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提高生态意识。中国生态文学研究会秘书长高桦对此感受颇深:“环境文学(生态文学)是以自然造化为本,借助文学这个体裁运用一切文学手段和技巧,表现为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的主题。像淮河的治理,有关的新闻报道也很多,但是远不如文学作品来得深刻,更具有潜移默化、震撼心灵的作用。”^[7]

许多生态文学作品通过描绘美丽的大自然,警示人类要珍惜自然、爱护自然。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使阅读者犹如置身于自然,感受自然的生机、美丽与和谐,得到精神上的净化与情感上的满足。正是这一美感享受,促使人们更加向往自然,热爱自然,同时唤醒我们的良知: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自己,珍爱生命——自己的和他人的、动物的和植物的生命,那就是珍爱人类自己!

应该说生态文学一直致力于先拯救人类失衡的灵魂,进而拯救衰败的自然,通过重塑人的生态观、价值观,引导人类采取一种新的合乎生态规律的生活方式,使得整个生态系统重新成为一个生命充盈的整体,真正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8],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

从兴起到繁荣的短短几十年中,生态文学揭示生态问题及其社会根源,传播生态思想,增强人们生态意识,改变人们对自然的行为态度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对政治、经济、生活等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有力地推动了西方环保运动的发展和生态政治的兴起。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为新版《寂静的春天》写的序言里,总结了卡逊对美国 and 全世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贡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款项……《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证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下转第88页)

者“和”赞助人——译者——译文读者^[6]表明,影视译作其实就是译者与赞助人对话之外,与原影视作品的创作者、与原影视作品、与译入语观众相互交流达成共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译者需要对原作者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倾向、世界观等有深入的了解,需要对影视作品所反映的时代、文化、意识形态等有全面的掌握,并熟悉译入语观众所具有与所期待的文化价值特征,译作就是译者与这3个方面因素协商的产物。其实,这一过程经由译者独立完成,是译者内在体验、思索、比较与衡量审度的结果,体现的是译者这一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即译者的主体性。

因此,作为译者,需要充分认识到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秉着负责任的精神,为观众译出更多优秀的影视作品,以满足人们日益高涨的娱乐与文化交流需要。

鉴于目前大量的影视幽默研究侧重从关联理论、目的论、功能主义目的论、概念整合理论等角度探索幽默语言、文化方面的语际转换,对于翻译中的关键角色——译者却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因此,

本文作为个案研究,根据影视幽默翻译中译者所选择的翻译策略,探讨译者的主体性,以期抛砖引玉,使更多的研究、翻译从业人员关注影视翻译中译者主体性、主体间性问题。同时,期望影视翻译人员能够提高翻译的效果,将更多的影视精彩传递给观众。

参考文献：

[1] CHIARO D. Verbally expressed humor and translation :an overview of a neglected field[J]. Humor ,2005 ,18 (2) :135-145.

[2] 顾铁军. 外国新影片翻译与研究[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3] 许钧.“ 创造性叛逆 ”和翻译主体的确立[J]. 中国翻译 ,2003 24 (1) 5-11.

[4] HERMANS.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M]. London :Croom Helm 2000 :12.

[5] 苏珊·朗格. 情感与形式[M]. 刘大基 ,傅志强 ,周发祥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3.

[6] 郑耀军. 翻译的主体研究范式的新转向 :从单一主体性到翻译的主体间性[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34 (4) :71-74.

(上接第 77 页) 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4]

如今,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现行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开始关心消费中的生态环境代价,寻找适当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呼唤既无污染又有益于健康的绿色产品。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开始更多地自觉承担起维护生态健全的责任。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高消费的物质生活既不可能长久地延续下去,也不可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安宁。梭罗的“简单、简单、再简单”的追求物质简朴、精神丰富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所以,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生态文学的呐喊,人类精神的拯救离不开生态文学的洗礼。

参考文献：

[1] 孙冬梅,张九雨.“ 荒原焦虑 ”与人类责任[J]. 中华读书

报 2003-04-09(“ 学说界 ”版).

[2] 转引自王诺. 从生态视觉重申西方文学[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6 (4) :119.

[3] 鲁迅. 呐喊·自序[M]//鲁迅全集 :卷一.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417.

[4] 蕾切尔·卡逊. 寂静的春天[M]. 吕瑞兰 ,李长生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5] 奥尔多·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M]. 侯文惠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194.

[6] 周杰林. 试论环境文学及其反馈作用[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5) :76.

[7] 王洪,舒晋瑜. 中国环境文学如何走出困境[N]. 中华读书报 ,1999-06-30(“ 时代文学·今日观察 ”版).

[8] 阮元. 十三经注疏 :下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1634.